

## 谁改变了世界——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一）

- 时间：2019-04-29 19:51
  - 来源：[经济导刊](#)
  - 作者：（德）汉斯-尤根·雅各布斯
- <http://www.cwzg.cn/theory/201904/48616.html>

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 UFJ 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



### 这世界真正属于谁

这个故事是从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曼的人开始的。他是个瑞士人。曾经有很多年，他担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是这家银行的门面，也就是德国经济的门面。他在所谓的“德意志股份公司”影响巨大，致力于将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理念输入德国。在2007-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他和德国的其他银行、中央银行以及政府部门携手一起，成功阻止了德国银行金融业的崩溃。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2011年秋天，他却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坐上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的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背后有这个权力和资本，可以阻止约瑟夫·阿克曼成功升任监事会主席呢？换句话说，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决定着德意志银行的重大事项？

###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后落在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那里。这家资产管理者所投放的资金数目惊人，高达 4.9 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也就是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以及所有的其他产值组合在一起，才只是这家世界金融公司所管理资产的一部分。这家公司向世界经济注入的资本相当于瑞士国民生产总值的 7 倍、奥地利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倍。据知情者透露，约瑟夫·阿克曼的任命与否，决定权在美国黑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总裁劳伦斯·芬克(Lawrence Fink)手里，人们称他为“拉里”(Larry)。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这位在金融危机时德国总理、德国各家银行总裁都俯首听命的强权人物，却在曼哈顿遭遇了滑铁卢。实际情况是，约瑟夫·阿克曼虽然曾是世界银行协会的会员，但他却没有获得一家进行秘密投资的资本公司的正式许可，而这家资本公司在全球几百家金融公司均有参股，并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以各公司集团的名义独立地进行投资交易。毋庸置疑，它也持有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 6% 的股份，因而属于德意志银行最大、且最重要的股东之一。这家公司在瑞士持有瑞士再保险公司（持股 4%）和嘉能可公司（持股 7.5%）的股份，在奥地利持有奥地利第一银行的股权（4%）。

是“拉里”阻止了阿克曼。黑岩这家纽约投资公司与所有和拉里一样的其他投资人都遵守相同的规则，这条规则就是，他们不会任命一位企业的领导直接调任该企业的监事会主席。在全球每一家黑岩所投资的企业中，只要是他们的权力所能够触及到的企业，他们都会影响那些企业的人员任命。对于他们而言，阿克曼升任监事会主席的愿望，只不过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设立储蓄账户一样，是资产累积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这一案例中，有一点已经浮出水面：这里存在一个全球金融经济权力网络，一个由全新的资本家所组成的运动队，一个在雷曼破产案之后逐步攫取了权力、并仍在继续攫取更大权力的资本家俱乐部。而且这个网络制定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全球，凡是它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都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即使它们所做的投资决定涉及的资本数量极其庞大，大到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之多，即使这些决定关乎许多企业、各类市场，甚至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它们仍然能够处于大众的视野之外，人们对它们仍然知之甚少。在大多数民众背后，它们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日益强大的战斗方阵。这个方阵由金融公司组成，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个具有战斗力的金融方阵在经济战争中会遭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阿拉伯的公侯王国资本、俄罗斯显贵的资本，这些资本也同样努力在经济战争中进行权力扩张。它们还会遭遇到养老保险公司这些巨大的亿万资本，以及大型家族企业的金融帝国资本。对于这些资本而言，它们一方面需要新产品和市场，另一方面为了进行资本投资，它们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交给拉里·芬克来管理。

## 谁在新资本主义背后掌控实权

这种由金融投资市场所掌控的新资本主义，反映出一种地缘战略性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拥有了武器的特点。那么，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这些正在角逐市场、资源、原材料的主角，它们到底是谁？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显性的、透明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如何？它们对付危机的羽翼是否已经丰满？或者，它们会不会向上或者向下转嫁危机？最后，它们会不会加重各种危机呢？

我们在此试图揭秘世界上真正掌握金钱的主人，从而揭秘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人物。在各国政界高官每天都占领媒体头版头条的同时，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新资本主义背后的实权人物却几无所闻。因为“保密”是这类组织的最高行动纲领。“这世界真正属于谁？”当今站在各个市场和市场主宰者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真正拥有资本权力的那些极少数人又是谁？大众通过日常媒体报道而得知的往往是这个体系中的高级雇员：各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在盎格鲁-萨克逊语言体系中，这些董事长有一个名字——首席执行官（CEO）。在这个圈子中，许多数字是公开的：他们的薪金、他们的特别津贴、他们的养老金收入、他们的企业经营政策、他们的履历。但大众对于企业的监事会了解很少，关于企业的所有者，知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公司所有者并不一定是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是总经理的老板，企业的终极老板。资本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异常有活力。在全球投资市场上，资本会在纳秒内自动做出投资决定，投资决策由计算机程序和各种算法来操控。

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政策规定，银行业应保证实现最大的信息透明度。但是各大商业投资机构远远没有重视国家的这项政策，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影子金融”。这也正是新资本主义的一个盲区，是人们所看不见的。我在这里大胆做出预言，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在这一领域内产生。银行业务被控制和管制得越严格，银行越会趋向于将资金投放到其他的投资机构中。

所有这些改革和创新的主张，如果没有背后那些极力谋求利用投资赢得利润的投资者，这一切仍然仅仅只是一种想法，只是没有未来的计划。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必须要询问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将最终拥有资本和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拉里·芬克掌握着曼哈顿金融市场的权力，他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总裁。约瑟夫·阿克曼和德意志银行的故事正如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的员工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德意志银行，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决策是不符合黑岩公司利益的。”

## 顶级资本家的最高领导

### 黑岩——拉里·芬克

人们都明白，芬克这位美国大佬实际上就是世界金融组织的总裁，他是顶级资本家们的最高领导；他比所有人都更有权力影响新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命运，他将“直升机撒钱”这种金融手段的另一种形式纳入了全球经济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位个体投资人向世界经济注入大量资本的必然结果：4.9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本数量就在黑岩公司（Blackrock）的管理之下，而黑岩是芬克在1988年与合伙人一起共同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公司的开端是流传在曼哈顿的一个传说，如今黑岩已经发展成金融业巨头。据说，芬克有意识地把黑岩总部设在纽约中城，而没有设在纽约下城的华尔街，这是因为，芬克先生既不想和华尔街的阴谋诡计有关系，也不想与波士顿茶会有什么牵扯。芬克比较特立独行，他比较赞成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监管，比较喜欢经济运行有一定的秩序。在金融帝国中，他是一位负责任的代理人，并且支持美国民主党。因此，当希拉里·克林顿计划组阁时，她想邀请“拉里”担任她内阁中的金融部长，对拉里而言，这是对他所作的社会政治

工作的认可。2015年，拉里的年收入是2.86亿美元，2016年4月，他获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卫·洛克菲勒奖，这些都是对他的认可。

拉里·芬克，这位黑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他的权力从何而来？以什么作为基础？芬克有1.3万名员工，黑岩公司就像一座黑色巨岩屹立在一道风景中。在这道风景中，人们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削弱了银行的能力，却增强了黑岩公司的能力。现在，芬克公司所从事的很多业务，都曾经是银行从事的业务。比如，黑岩公司向一些公司提供贷款，它持有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康采恩的股份，还拥有重要的数据分析计算机系统阿拉丁，它经营许多资本市场基金，黑岩购买国债、投资不动产，并向各国中央银行及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这一切对于拉里而言，已经具有彻底的全球化意义，也包括全球性的利益冲突。拉里作为金融投资高手，他的娴熟技艺是在华尔街第一波士顿银行（目前已升值成瑞士信贷集团）练就的。在这里，他在优先权证券和抵押贷款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后来他开始独立经营金融公司。一开始，他在黑石这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保护伞下工作，一直工作到1994年。然后，拉里转入匹兹堡金融服务集团，他的工作享有高度自主权。1999年，他的黑岩公司成为上市公司，2006年，黑岩收购了美林银行旗下的基金公司，2009年收购了英国上市公司巴克莱银行。这样一来，芬克最终荣登资产管理者榜首，黑岩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鉴于拉里的巨大权力，在每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权贵论坛上，许多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们都争相与他交谈。2011年，欧震华（Stuart Guilliver）旋风式地从伦敦飞到纽约，以获得拉里·芬克的支持，确保自己能够成功升任汇丰银行董事长。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席执行官或金融董事都和拉里及其团队取得联系。假如不联系，或断绝与拉里团队之间的关系，他们承受不了其后果。一旦出现了大麻烦，或者出现了信任危机，那么后果可能就是减持股份、讨论正确的管理，实际上就是走马换将。有一点直接与德国经济界30家最佳公司的高管、与所有公司领导都直接相关，这就是德国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指数达克斯。黑岩在所有达克斯上市的股份公司中都持有股份，它是股东，而且持有一些重要投资项目的股份。比如，黑岩持有拜耳（7.0%）、戴姆勒（5.2%）、巴斯夫（6.2%）、大众（近4.0%）和西门子（5.6%）等公司的股份。黑岩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撒在德国整个金融体系中。更能代表黑岩公司权力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德意志银行和安联保险公司是德国两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黑岩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是6.2%和5.4%。

## 影子银行

黑岩用于投资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自愿产生的，它是全球最大的被动投资公司，为了能够复制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指数，它需要在所有上市公司均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由此，这位黑色巨人就自然而然地持有德意志银行6.2%的股份。

在金融市场的专业术语中，黑岩公司属于“影子银行”。正规的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的管制和整顿越严格，影子银行的业务就越繁盛。这确实有一些讽刺意味。当然，黑岩公司老板在1986年就曾在第一波士顿银行做错了那一宗抵押贷款业务，这对2008年的金融风暴也起到

了推动作用。目前，芬克可用于投资的大量资金来自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基金会、国家基金和家族控股办公室。这些公司寻求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这一投资市场人们称之为“紧急状态投资”。这一名称颇有谄媚之嫌。在美国，黑岩持有苹果公司 5.75% 的股份。在其他大公司也有持股，比如微软（5.8%）、埃克森美孚石油（6.0%）、通用电气（5.7%）。在这几家公司中，黑岩的持股是决定性的。

世界头号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和全球其他金融公司之间相互参股渗透，它们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黑岩在摩根大通银行持股率达到了骄人的 6.6%，在道富这家全球第三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 5.1% 的股份，在普信集团这家全球第 11 位金融公司持有 5.9% 的股份，所有这些公司也以较低的持股率持有黑岩公司的股份。实际上，黑岩所持有的各家大企业的股份都是少数股，但是如果把黑岩所持有的所有股份加起来，就超过了多家基金会所共同持有的股份总和。更重要的是，黑岩这家公司系统性地幕后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这一切都经由黑岩公司的雇员团队来实现。这个团队成员分别在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和香港工作。黑岩公司所投资入股的所有基金，无论是主动投资基金还是被动投资基金，当然也负责在基金公司内部的投票表决，在全球所有的地方都践行相同的准则，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我们是长线投资商，所以我们对建立长期关系很感兴趣。”黑岩欧洲部主管阿姆拉·贝莱克（Amra Balic）说。黑岩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并不出现在各家公司的全体股东大会上。但是，假如在会议开始前的讨论中一无所获，黑岩一定会反对各公司高管的一些建议。在英国，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金融公司曾经多次就公司高管所提出的一些一揽子薪酬建议投了反对票。拉里·芬克说，他只是资金的托管方。“假如我们将亿万资金都投资于一个产品，那我们就太大了，但是实际上这些资金并不属于我们。我们会将三分之二的资金投资于上市公司和其他指数基金（保值基金），这些资金我们并不主动进行管理。对我们而言，这一部分资金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黑岩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保值性基金，它是保值基金的头号投资商，仅在安硕这支基金，黑岩的投资额就超过 10 亿美元。安硕是原来巴克莱银行收购的一家基金公司，它已经占领欧洲 50% 的市场份额。据内部信息分析和估算，到 2021 年，欧洲金融市场的规模会翻倍成万亿美元的市场。

黑岩公司所拥有的超级权力已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警觉，它不愿意出现在政界、在公众面前或在金融市场上。比如，监管部门开始关注黑岩在投资市场上的基金及一些与银行业务类似的业务。最令监管部门担忧的是黑岩的数据分析系统阿拉丁，许多资本管理者也在阿拉丁设立账户，在这个系统里流通的资金量已经有 14 万亿美元。对于投资者而言，它是一种类似 SAP 的金融管理软件。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的阿拉丁用户总计有两万名，这些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黑岩看到整个金融世界。

黑岩公司很喜欢招募一些著名人士，比如，曾经是瑞士中央银行行长、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前主席的弗里德利希·默茨（Friedrich Merz）现在是黑岩德国子公司的总裁。社会名流维系了各种关系。其原因在于，拉里·芬克的抱负还要更高更远一些。黑岩应该还有其他的业务领域，这要依靠政治的帮助。

每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芬克都会不遗余力地主张，美国应该节俭。一个只有 12000 美元积蓄的普通美国人，如果他就这样退休，那他的退休金就太少了。对芬克而言，澳大利亚是个榜样。在澳大利亚，根据当地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将雇员工资和薪金的一部分作为积蓄，积蓄比例最高达 9%。芬克说：“这样的话，作为这一法律政策的结果，澳大利亚人将来在退休后，将会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对于他的黑岩而言，这个榜样就是一个梦想。如果实施这样的政策，他的公司将会成为试验学校。拉里·芬克也知道，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非常想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控。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黑岩公司的透明度不够高，所以，它拒绝黑岩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参股。

## 黑石——史蒂夫·施瓦茨曼

史蒂夫·施瓦茨曼 (Stephen A. Schwarzman) 是黑石 (Blackstone) 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在德国市场上，黑石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多，比如黑石目前以 45% 的持股比例参股了传奇式相机生产商莱卡公司。2011 年起，黑石参股了德国室外用品专营商狼爪，并将继续增资 7500 万欧元。在塑料生产商科佩集团，黑石甚至已经是公司所有者和顾问。

与其他基金公司和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像黑石这样的私募股权公司会积极参与各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在黑石所参股的企业中，资本投资与企业决策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企业，资本参股与公司决策权的关联都不很明显，由所有者或家族经营的企业除外。黑石甚至在上市公司德国电信也经常引起躁动。从 2006 年起，黑石一度持有德国电信 4.5% 的股份，除了联邦政府这位大股东之外，黑石成为德国电信的第二大股东，劳伦斯·古菲 (Lawrence Guffey) 代表美国人任职于德国电信监事会。黑石曾经力劝德国电信向马来西亚投资，但德国电信不想像施瓦茨曼一样去做全球投资商，最后这位美国大神才妥协。

现在，施瓦茨曼这位黑石总裁已经深知，针对他的私募股权投资，德国人一直都怀有很强的保留态度，德国人曾骂他们是“蝗虫”之灾。假如人们把黑石公司仅仅看作是一家参股公司，那就大错特错了。2015 年，施瓦茨曼所管理的资产几乎达到 3400 亿美元，与其他的竞争对手相比，黑石的资产价值可谓遥遥领先。2015 年年底，黑石公司的私募股权业务涉及的资产价值超过 940 亿美元，正好占总资产的 25%。黑石的金融业务种类越来越丰富，仅贷款业务总额就将近 80 亿美元，实际上黑石已经是一家银行了。它所投资参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并不显示在投资公司自己的收支平衡表上，投资公司通过贷款基金筹集贷款，它们将直接在投资人那里进行再融资。这样一来，投资公司就具备了传统银行的职能，当然它们与原来的私人银行无法相比，而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私人银行中，银行家以自己的私人资产作为银行责任，并经常与自己的客户一起进行投资，而这种私募股权公司需要施瓦茨曼个人承担风险的资金数额很少。

黑石在不动产业务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2007 年，黑石以 39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办公物业信托基金。2016 年中期，施瓦茨曼已经跃升为全球头号房地产所有者。因利率过低，促使黑石继续购买房地产，而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其他金融公司只能望其项背。2015 年，黑石旗下不动产的总值已达 1350 亿欧元，全球只有加拿大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动产总值略超黑石 (1370 亿欧元)。从此，黑石继续增加其房地产投资，在美国和印度，没有哪



家公司比黑石拥有更多的办公大楼。负责房地产投资的经理是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格雷的经典收购案例是，2007年，他以260亿美元把希尔顿从股市上买走，2013年12月，他又将希尔顿上市并大赚了一笔。目前，有5万栋出租房属于施瓦茨曼帝国。2017年，这些出租房将统一上市。在富国银行、通用电气的支持下，黑石以230多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房地产资产组合，这一作法和黑石当年购买曼哈顿史岱文森城这个项目如出一辙。当时，黑石出资53亿美元，但黑石的这一项投资失败了。在德国，2016年年初，一系列物流企业的地基已经出现。下一步，黑石准备购买“第一办公”这家德国办公室租务集团的100座办公大楼。这曾是德国房地产公司IVG的核心业务，而IVG正陷入了支付困境。

私募股权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短期参股一些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这些私人企业尚未成为公开募资的上市公司。黑石的资产组合中，有90多家私募股权企业。黑石也会购买上市公司的一揽子股票。此外，黑石也有收益颇丰的对冲基金业务，对冲基金业务占黑石总业务的五分之一。实际上，黑石集团的业务领域已涵盖所有的另类投资业务。

自2007年起，黑石公司就已经在股市上市。2015年5月，黑石的市值达到了高峰。但在随后的8个月内，其股价狂跌，下跌了50%。黑石的盈利状况波动很大：2012年，黑石的税后收益超过8亿美元；2014年，其收益猛增至370亿美元；2015年，黑石收益又降至160亿美元。但这只是黑石公司本身的收益，不包括黑石旗下各基金的收益。私募股权行业颇受争议，这也是因为在手续费核算方面经常是不透明的，当然，2%的基准手续费除外。在2014年的收益中，共有58%来自运行费用，这是与投资经营收益挂钩的费用（每单投资收益的20%）。收入增加与收益增长同步，这是拉里·芬克的黑岩和美国普信集团合谋实现的，这两家资产管理巨头所拥有的资产总值是黑石资产总额的15倍之多。

史蒂夫·施瓦茨曼是黑石公司首席运行官兼董事会主席，他管理着近100亿美元的资产，被媒体称为“华尔街之王”。这个人物不会总那么客客气气的。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曾经计划对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增加征税，施瓦茨曼将这些计划比喻成“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后来，共和党人取消了这些计划。

施瓦茨曼和私募股权行业的其他经理都受益于一项规则。按照这项规则，私募收益中的一部分叫作“运行费”，它从与收益挂钩的手续费中抽取。运行费会与资本收益一样来纳税，而不以劳动所得税来纳税。这一收益叫作“共享收益”，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古代海运时期。那时船长会从其所运商品的收益中收取一部分费用。在美国，长期资本收入的纳税率最高是20%，而工资收入的纳税率最高可达40%。私募股权行业中这项原则所导致的后果是，经理人会有一笔逻辑上讲不通的额外报酬。有时候，这些经理的额外报酬甚至是美国一些大银行总裁所获薪金的很多倍。

对于史蒂夫·施瓦茨曼而言，收入高低关涉他的个人荣誉。收入更多、社会地位更高、财产更多、股值更高，这一切都是竞争成功的一种表达方式。施瓦茨曼希望自己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他很成功，所以他很富有。2015年，加上他的资本收益，施瓦茨曼一年的总收入是8亿美元。如此高的收入，大部分中型企业家只能做梦才能实现。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约6.4

亿美元)来自于他所持有的黑石股份的红利。他持有黑石公司约20%的股份——他的“共享收益”总计8800万美元。

早在几年前,施瓦茨曼的年收入就以类似的规模在增长,毫无疑问,施瓦茨曼在金融界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施瓦茨曼来自费城,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31岁的时候,施瓦茨曼担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在全球进行企业并购。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他与上司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成为好友,彼得森曾任尼克松政府的商务部长,这位保守政治家有很好的关系网,他与施瓦茨曼这位金融管家的融资智慧一起形成了一种适应市场的最佳结合。1985年,这对合作伙伴成立了黑石公司。自成立以来,黑石公司已经买卖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企业资产。

施瓦茨曼是位神通广大的公司老板,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提高私募股权业的行业形象:趋利避害的世界观、大量商业理念、外交手段、权力欲、荣耀和尊贵,以及出手阔绰。纽约布莱恩公园附近的纽约图书馆有一条漂亮的艺术走廊,这条走廊就是以施瓦茨曼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支付了这条走廊的修葺费。在清华大学,他以1亿美元成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该项目被命名为“施瓦茨曼奖学金”。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每一个人都想去实现。当然,施瓦茨曼也享受着富豪的终极奢华——极品艺术品。曾有一次,他想在府邸挂上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油画《黑板》,便直接请世界头号艺术品经销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帮忙,从韩国购得了一幅画。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成功的标志是这样的:施瓦茨曼的纽约公寓价值3700万美元,它曾经属于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施瓦茨曼在佛罗里达拥有一处沙滩别墅,在长岛、圣特罗佩和牙买加,施瓦茨曼也有房子。

如今,这个人想树立多个标杆,他说,黑石不仅做生意,而且黑石有“一种使命”,它应是“最好的公司”。2007年,为了庆祝60岁生日,施瓦茨曼邀请了1500位客人齐聚纽约上东区,这次庆典花费了3000万美元。这一年,施瓦茨曼以最佳形象示人,这完全符合他曾经的战斗格言:我要战争,不要小打小闹!因为施瓦茨曼把它的公司定义为“有限合伙公司”,其他参股人都无权参与决策。黑石公司精心挑选了它的上市时刻,那是在2007年,不久之后,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所冲击的核心是银行,而不是参股基金和对冲基金。

史蒂夫·施瓦茨曼知道他的幸运应归功于谁。他每年坐飞机旅行的时间有6个月,他要去拜访那些机构投资者,也就是那些养老基金或国家基金的总裁,比如他要飞去阿布扎比。他最好的客户是大投资商,这些大投资商想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在股市之外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大投资商往往是一些大的私人投资者。在追逐了丰厚利润之后,金融领域的顶尖高手显然还要树立一个特殊标记。

## 凯雷——大卫·鲁宾斯坦

长期以来,鲁宾斯坦最大的担心是,全世界都可能将他的公司看作是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的枢纽。在伊拉克战争和安全人员滥用监控信息丑闻之后,这在国际上对公司生意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凯雷资本集团(Carlyle Capital)成立于1987年,在它最初成立的几年中,许多订单都来自军工行业。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 Rubenstein)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小威廉·康威



(William E. Conway jr.) 和丹尼尔·德安尼罗 (Daniel A. D'Aniello) 曾经想过这个主意：围绕军工系统建立一个投资参股公司。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网。

鲁宾斯坦很了解政治，1977 至 1981 年他曾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政府里工作过。当时他负责治理通货膨胀，而当年的通胀率已经上涨到了 15% 以上。鲁宾斯坦在政治上接近民主党人，但那些后来在凯雷工作的政治家却来自共和党阵营。

后来，凯雷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鲁宾斯坦的实力越来越强。即使在这个时期，鲁宾斯坦仍和民主党前总统卡特保持着关系。鲁宾斯坦和乔治·布什的关系比较紧密，小布什在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之前，曾代表凯雷在“凯特空”这家航空服务公司的监事会任职。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之后，鲁宾斯坦立即将克林顿政府的亲信们招聘到他的公司。鲁宾斯坦并不是思想家，他更像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鲁宾斯坦并不以向政党捐款而引人注目，也不认为有必要声明自己到底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说：“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鲁宾斯坦认为，凯雷从来没有对政治施加过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公司形象问题。

凯雷这家私募股权公司早已经脱离了军工企业而独立发展了。他们买卖一切，只要它们能带来利润——从炼油厂到火车铁轨。最近几年，和鲁宾斯坦做生意的包括餐饮公司唐恩都乐、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赫兹租车公司。2007 年，阿联酋阿布扎比穆巴达拉这家国家基金以 7.5% 的持股比例投资了凯雷旗下的“合伙单位”基金，后来穆巴达拉还增加了持股比例。加州养老基金也是凯雷的大股东。四年之后，凯雷公司收购了荷兰阿尔卑斯投资总公司 60% 的股份，该公司负责管理养老基金。如今，凯雷所管理的资产总值约为 2000 亿美元，它在私募股权行业中名列第二。

自 2012 起，凯雷成为上市公司。凯雷共有上市股票 3.25 亿美元，其中有 8100 万美元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但是，2015 年凯雷的股价缩水了一半，2016 年股指飘摇不定。为了救市，2016 年 2 月，凯雷投放股市 2 亿美元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油价下跌，全球经济不稳定，投资人对手续费过高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对凯雷的股票市值都有损害。

鲁宾斯坦的资产约为 22 亿美元，凯雷是鲁宾斯坦成功的标志。2011 年，鲁宾斯坦的收入是 1.4 亿美元，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的年收入与他相同，他们收入的 90% 以上来自于投资人的收益。2014 年，鲁宾斯坦得到的基础年薪是 27.5 万美元。与他的投资收益相对比，这份年薪显得很谦虚。

鲁宾斯坦的父亲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邮政局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鲁宾斯坦年轻时是一个书虫，他想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鲁宾斯坦至今仍保留着阅读习惯，他每周阅读四五本书，每天至少读六种报纸。他的努力是值得的：鲁宾斯坦属于上流社会中的千分之一。

鲁宾斯坦把时间用于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比如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导师委员会主席。在和习近平主席一起用餐时，他提到一句有关成功的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过，无论鲁宾斯坦多么勤劳，在他的巨大王国里，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很成功。比如，从2014年起，凯雷旗下的对冲基金克拉伦道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从投资人手里掠去了60亿美元。2015年，鲁宾斯坦本人的房地产生意却创造了27%的梦幻收益（对比一下，他的主要基金的收益率是13%）。

## 世界真正属于谁

### 巨人之间的斗争

曾经的金钱贵族、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基金之间如何明争暗斗？它们如何争夺世界霸权？

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UFJ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这是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数万亿资金在自由流动，跨越国界、跨越各行各业；它每天都给企业、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强的压力。资本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化，这种国际资本不论肤色、不论宗教信仰，它只关注最低收益和再投资。这种国际化的资本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可治愈的力量。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不确定的工资和很低的社会福利标准，当前也因为有几百万移民。紧跟着“资本”的全球化，“劳动”这一因素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

在世界经济中，资本和数据有如此强大的驱动力，它们能够决定企业的权力，从而也决定企业所在国的权力。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拥有这些资本？谁拥有这些数据？这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属于谁？如今，这些问题变得极为迫切而现实。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执掌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以怒气冲冲的亿万富翁形象示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凡此种种表达了一种感觉：世界的这种发展只是让小团体更加富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价值观的含义，摧毁了迄今为止的经济秩序。金钱的权力决定着政治，即使四年一次大选也几乎不会对此作出任何改变。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各国政策的重新民族化，这不仅仅发生在欧盟的东部国家中。西方最新趋势是“民族与社会相遇”，更极端一点就是“民族的-社会主义的”。[1]经济的重新民族化可能紧随其后。这有了第一批警告信号。怎么看这种发展呢？

在全球经济中，很少有一个领域像金融业的扩张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印象。1970年，美国在打越南，苏联在大力发展军事武装，前联邦德国则敢于搞更多民主，也包括经济上的民主。

在那个年代，世界金融资本的水平与地球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一致。然而 1971 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决定，美元与现有黄金储备脱钩，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自由负债，钱钱交易随之爆发了。统计数字表明，1980 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为 12 万亿美元，商品生产量是 11 万亿美元。1990 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已经是 56 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只有 23.3 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似乎还算理性。到了 2000 年，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比例是 119 万亿对 33.3 万亿。金融市场数额几乎达到了商品与服务市场数额的 3 倍。

今天的金融业务量几乎是商品生产量的 4 倍。全球国债、信贷、股值、贷款的总额大约是 270 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总量为超过 73 万亿美元，而且实体经济或多或少在滞涨。未来金融业务量对实体经济的比例将会更高。在世界经济史上，金融市场从未发挥过这样的主导作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且金融力量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换句话说，那些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在金钱中游泳，对他们而言，满地都是黄金。货币政治家在一些重要的中央银行中每采取一次扩张措施，包括每一次降息、每一次国库券发放，本来就多维度的金融资本就会再一次膨胀壮大。

这简直太明显不过了。这些资本仅仅在金融业中循环，它们仅仅供养着金融资本业。在过去的 25 年中，即使这些资本确实流入了实体经济，却更经常地被实体经济用来在股市回购自己的股份，这种做法再次使股票指数冲高。或者，这些资本被用来支付公司并购和接管，使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企业的集中化程度继续提高，新的企业经营活动并没有产生。有一个实例，2016 年德国拜耳集团以 660 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孟山都。今天，百威英博啤酒集团控制着大约 30% 的世界市场，孟山都控制着种子市场的 26% (拜耳持有 30%)，雀巢和荷兰 JDE 共同瓜分世界咖啡市场的 40%，嘉能可控制着 60% 的世界原料贸易，四家公司集团 [2] 分享大企业的经济审计市场，万豪集团占有世界最重要酒店集团的一半，陆逊梯卡公司制造全球大多数的眼镜架。毫无边界的货币增量导致企业的高度集中，而世界对这一点还没有看清楚。

如果说，这是金融世界的凯旋路，那么这个胜利凯旋与官方正规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少。自 2008 年以来，正规银行受到来自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正规银行也已经不能再充当世界的管控机构角色了。这场凯旋更多与“影子银行”的那些繁茂丛生的高管相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现在它们在做普通银行所做的业务，比如发放贷款、支付房产或者做公司生意。对于新资本主义的疯狂世界而言，传统银行职员，尤其是欧洲的传统银行职员就像是一种银行官员，他必须注意那么多规定，以至于失去了生意机会；他必须为自己的银行组织自有资本，以便使雷曼兄弟银行或者德意志银行之类的赌博不会发生，然后他就将赌博和投机资本主义留给所有那些很少受到整顿的人。

世界属于一个类似拉里·芬克的人，他掌管着黑岩，黑岩的投资资本几乎有 5 万亿美元。这世界并不属于约翰·克莱恩 (John Cryan)，他的德意志银行慢慢地变得资本不充足，越来越直接依赖于黑岩的意志，黑岩是他最大的股东之一。2016 年春天，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克莱恩称芬克是世界流动资金的“最后一级机构”，已经超过了中央银行的位置。这世界也属于一个叫史蒂夫·施瓦茨曼的人，他的金融公司黑石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拥有者。

在这种金融资本主义中，人们要的永远是获取更多，人们并不要受损的市场。这个市场因零利息甚至负利息而受到拖累，这把投资国库券变成了幸运游戏一样。专家们将一切比市场平均值更好的东西都称作“阿尔法收益”，在一个行业中为寻找尽可能多的“阿尔法收益”使许多人躁狂。一位德国经济界重要的监事会成员说：“压力总是来自投资人。”投资人越来越强调寻找“阿尔法收益”：“管理人选对了吗？要不要更换管理人呢？我们需要并购吗？”

270 万亿美元，世界金融资产的总额——这是全球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数字。与此相关，风险发生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在新经济风潮(2000 年)和雷曼兄弟银行的烛心融化(2008 年)之后，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发生另一场灾难，那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至少有一些趋势，这很值得人深思。

**趋势 1:** 1995-2005 年，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增长率超过了 300%。资产管理公司共有 74 万亿美元可供使用，仅这一项就已是世界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总量。该行业中的十大巨头所拥有的资本超过了 20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企业 500 强的股值总和还要多一点，而欧盟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 16 万亿美元。那几家为数不多的美国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资本公司中作为大股东出现，他们经常是最大的股东。这是一种新的垄断，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趋势 2:** 公共资本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意义迅速提高了，而且会继续提高。在过去 20 年中，大部分国有的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基金从 8 万多亿增加到了 36 万亿，是原来的 4 倍。在这期间，国家基金又从 5000 亿美元增加到了 7.25 万亿美元。从这一资金源泉中有大量金融资本流出，被用于最大胆的政治目标。国家资本管理者试图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投资提高国民的资产，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要为退休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储备。但是，他们经常只在最远的地方挣得收益，正如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一样，他们如何用钱赚钱，这些国家基金也如何使钱生钱。这些富翁们就是行话中所说的“高净值人士”(100 万美元以上)，或者“超高净值人士”(3000 万美元以上)。

**趋势 3:** 财富分配不平等，尤其在非洲和印度非常明显。在那里，上层社会人士只占社会总人口的 1%，却拥有全社会资产的 47.2% 或者 53%。这个数字在北美(36.7%)和欧洲(32.2%)还不是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够高了

终有一天，对大数据的拥有权会形成新的权力体系，正如对金钱的拥有权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数据早就已经被推到了“资本”那一边，数据甚至是“新”的资本。这世界也属于那些人，正如来自美国西部的四大公司一样(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那些拥有数字经济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可以与那些对冲基金计划抗争，并确定自己的标准，而且他们要把自己的标准带进世界中去。作为规律，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谁能用数据吸引资本，谁就会崛起。华尔街和硅谷是这个标准的密码。

这种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的驱动器，是雇员和被保险人的养老退休保险金所产生的几十亿和千万亿资本，这是通过退休基金和保险集团来投资的。在世界市场上，这类“预防资本主义”遇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基金、国家参股和工业帝国的巨大资产。所有这些资本

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在我们眼前上演着的是一场全球分配大战，是在世界范围中争取最佳地位的角逐。

大众集团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目前陷入重重困难。关于大众，各方纷纷扰扰、争执不断，这实际上是战场，正上演着这些权力战争，发生着各种文化之间的经济混战。在这里，所有那些利益集团都相遇了，他们要打得头破血流，无非就为了努力争取让这世界属于它们。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个家族（甲壳虫发明者的继承人）、战略性国家资本（这里是下萨克森州）、工会和投资基金结盟（比如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或者卡塔尔投资局）、资产管理商（比如黑岩和安联），以及全球投资人。围绕大众汽车公司上演的资本战争大戏，可以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教科书。[3]

这世界属于谁？从历史上看，世界首先属于那些军事征服者，他们创造了权力，吞并异国领土，实施经济剥削；他们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推广传播他们的文化。随着军事权力的扩张，贸易关系逐步增强，这使商人更加富有。战争和财富是联盟伙伴，海路的控制权是通过强大的海军获得的，于是各大帝国纷纷建立海军。从历史上看，庞大的资产都产生于贸易、发放贷款或者拥有土地，其后果是对农业经济或对土地资源的剥削。举例来说，几百年来，佛罗伦萨的豪门贵族富雷斯可巴第家族（Frescobaldi）一直是大地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生产葡萄酒。他们曾经发放贷款，借贷的人既有英国国王如亨利八世，也包括教会的主教们。

19 世纪的征服者就是那些工业先驱们，他们沿着河流定居，比如在莱茵河畔定居，河水可以用来生产药品；比如在巴塞尔，定居的家族包括霍夫曼家族、罗氏家族、山度士家族、嘉基家族（Geigy）和克拉维尔家族（Clavel）。工业先驱的家族更喜欢定居美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逐步上升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1837 年 4 月 17 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美国出生，他和一些大工业家如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一起，主张建立大企业集团，这些工业集团应该控制经济，并因此使美国上升为全球经济大国。他们代表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的范德比尔特建造了铁路线，卡耐基锻造了钢铁，洛克菲勒用原油创造了超大规模的能源企业，后来这家巨型企业因为新的反卡特尔法而被分解。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留给纽约市和美国的银行包括 JP 摩根大通银行、摩根斯坦利银行和一家艺术品收藏馆，馆内藏品包括艺术大家提香（Tizian Vecellio）的名画。在他那个时代，摩根拥有一种至高的权力，今天甚至金融业最大的那些金主都不可能拥有他那样的权力。正是这位摩根先生，收购了卡耐基的钢铁厂，并锻造了美国钢。1907 年，美国发生银行业危机，摩根这位磁石般的金融家把自己的巨额私人资本投入到金融系统中，并促使其他银行家和他一起行动，从而度过了金融危机。几年之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成立了，这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这家中央银行有私人所有者。很清楚，以私人资本拯救类似的金危机的情况，下一次不可能再有。

[1]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就是纳粹——译者注。

[2]指国际四大律师事务所毕马威（KPMG）、普华永道，德勤（Deloitte）和安永。

[3] 译文索引：狮子酿 (L?wenbr?u)；弗朗西斯卡纳 (Franziskaner)；奥德隆酒店 (Adlon)；汉森宫酒店 (Palais Hansen)；德班斯大酒店 (Grand Hotel des Bains)；绮年华 (Eterna)；劳特莱 (Rotary)；希格 (Sigg)；桑坦德银行 (Banco Santander)；孟山都 (Monsanto)。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

## 谁改变了世界——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二）

• 时间：2019-05-09 17:33

• 来源：[经济导刊](#)

• 作者：（德）汉斯-尤根·雅各布斯

<http://www.cwzg.cn/theory/201905/48802.html>

“这世界属于谁？”我们认真讨论了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状态，提出了权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已经消失，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不再依赖于我们，也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老板们，即使他们是强大的首席执行官；也不再依赖于议会或各国政治家们。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依赖于管理着巨额资产的那些人，其资产规模之大难以想象。他们可以让资金在全球流动并追逐资金。他们利用其他人的资产在工作，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人造世界”。



### 世界真正属于谁——黑岩式资本主义

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像洛克菲勒、摩根或凯撒这样的资本主义极权人物，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法则和政治控制越来越阻止这类人物的再现。一位企业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或者通过继承一家有市场能力的公司，或一位金融行家如乔治·索罗斯，懂得如何成功地投资，财富和权力就出现了。

但在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却有一种新的权力，这个权力位于资本募集地，就是金融业所说的“资本池”。一些权力人物募集了几十亿加上几十亿，几万亿又几万亿，在世界经济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他们。金融的原理是：谁离金钱最近，谁就能赚最多的钱。[1]富人

们、家族办公室、基金会，尤其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国家基金，他们都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委托给资产管理者来投资。没有人比资产管理者离金钱更近、拥有更多的金钱，并足以凭借金钱的力量来影响市场。在资产管理行业有一条最高原则：胜者赢得一切。谁拥有得多、谁挣得多，谁就获得的多。这被英格兰银行总裁安德鲁·霍尔丹称之为“资产管理时代”。

金融资本主义的钱柜里放着大约 80 万亿美元，这必然意味着权力。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研究，到 2020 年这个数额将会上升到近 102 万亿美元。仅全球最大的 5 家资产管理商就向全球市场投资了近 15 万亿美元，每家至少投资 1.4 万亿美元。市场和企业就这样形成了。一切不必投资的就不存在；一切可以支付的，可以发展成一家高盈利公司。

令人瞩目的是，那些决定短期资金去向的决策者是来自印度、俄罗斯或者法国的数学家。全球 70%-80% 的有价证券交易通过计算机系统计算，他们对媒体和分析报道做出反应，如果德意志银行被人猜测是“新的雷曼兄弟银行”，他们会立即自动发出命令：快！卖掉！

这个系统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所谓“不可估量的分散式股票持有者”。它的含义是，股票分散在许多集团或个体手中，但是“所有权可以广泛分散”这种经典假设已经不成立了。真实情况是集中化。西班牙 IESE 商学院教授艾瑞克·韦伯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极端集中化”。他说：

【“金钱并不是流入物品生产领域，而是流入金融产品中，在金融产品的背后并不出现物品。”】

韦伯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俄罗斯人在一家客店看了一下房间，留下 100 美元。客店老板把这笔钱给了村里的木匠，用于偿付定制客房柜子的欠款。木匠用这笔钱支付木材供货商，木材供货商又用这笔钱来还清欠生活用品店的债务。这样一来整个村庄没有了债务。但这位俄罗斯客人又不想住这个房间了，想要回他的 100 美元。而客房老板就必须从其他人手里借钱。

这个故事说的是：金融资产的另一面意味着债务，债务是资本主义的鲜血。金融资产高达 270 万亿美元，说明世界上同时就有这么多的债务，为了利用债务，就会不断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这使得美国的金融行业能够如此兴风作浪，以至于美国公司收益的 25% 就从这里诞生。“金融化”和“经济体系的金融化”促使全球资本越来越集中转移到越来越少的几家资产管理商和资本募集者手里，他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资金。德国 50% 的上市公司中，有关金融资本的信息交流是老板们的事情——董事长本人承担责任。像黑岩这样的巨型资产管理商成为典型。

健康的市场经济本来应该能够平衡各种力量，但是黑岩这些年来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本，多得令人震惊。在此期间，拉里·芬克这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控制着大约 4.9 万亿美元。黑岩几乎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大企业里都有参股，当然也参股了德国达克斯股市指数成分股最大的 30 家企业，而达克斯指数是德国经济的晴雨表。同样，黑岩也参股了在瑞士股市和奥地利股市的所有企业。在五分之四的达克斯上市公司中，黑岩是这些公司最大的前三名股东之一。据德国投资关系协会数据统计分析公司，黑岩集团持有达克斯股份的 10.7%。来自波士顿的资产管理商道富 (4.3%) 和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 (4.1%) 都在黑岩之后，并且持股比例比黑岩少很多。另一方面，挪威投资公司持有黑岩 5.7% 的股份，是黑岩的第三大股东，位居威灵顿基



金公司(6.0%)之后；黑岩最大的股东是来自匹兹堡的 PNC 金融服务集团。而黑岩也持有 PNC 集团 5%的股份。以这种方式，金融经济完全属于它本身，这是一个封闭的运作体系。

在德国，由纽约控制的金融网络把德国股份公司的老系统解散了。而在德国老股份公司的权力系统中，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总裁们是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这 3 家金融巨无霸相互参股，持有德国最重要企业的股份，组成最重要的监事会，共有 60 家企业参与其中。这就是经济界“谁是谁”的隐秘所在。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投资银行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价值，包括持股人价值。2002 年，按照社会民主党政府格哈德·施罗德的改革方案，出售公司股份不必纳税。与之相适应，3 家德国金融巨无霸迅速分开自己所占有的资金。这样，德国开始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在奥地利和瑞士，不存在类似像德意志银行与安联如此紧密的金融机构关联。

现在，金钱这条线只通往权力，这条资本线除了国家基金和养老金基金之外，通向拉里·芬克。德国股份公司就像是一个旧蜘蛛网，由德意志银行和安联联合交织而成。现在，美国人拉里·芬克插足了这个蜘蛛网，黑岩就是曾经的德意志银行。人们都怀有一定的期望，都想知道黑岩或其他机构投资人的政策是什么。这是行动指南，决定着战争与和平。所谓“战争”就是在全体股东大会上的“反对票”，这可能导致大宗股份的出售、公众场合中不受欢迎的言论和宣传运动。所谓“和平”就是在股东大会上的和谐、增持股份、面对记者和银行分析家时的沉默。

黑岩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募集地，因为它参股全球上万家企业。在达克斯，黑岩同时以 9 家基金的方式参股了所有公司。当黑岩想成为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股东的时候，德国金融监管局要求美国人将其基金结构完全透明化，这简直是妄想。资产管理者会利用所谓“理想托管人”这种利器，如“股东投票代理公司”。他们代表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负责表决和带动大会情绪。美国机构股东服务公司、格拉斯·李维斯和英国爱马仕股权所有权咨询服务，就属于此类公司中著名的意见领袖。

但是，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政策到底由什么组成呢？这些规则包括，一位董事即使在法庭上，也必须承担应付的责任，不能减免；另一条政策是，董事会主席不能在卸任之后立即担任监事会主席，而这是管理者们最希望的，因为他们可以继续保留担任 CEO 时留下的的遗产。还有一个规定是，一个人不允许同时担任太多的监事会成员。这些规则本身很理智，而实际上这种责任仅仅建立在资本数额的增加上。对企业的监督却消失在不透明的系统中，许多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投票，但他们可能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权力关系。

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公众股份公司都是按照美国的核算系统做结算。这是一种美国权力系统，它是建立在资本市场的基础上。

大笔资本是主动投资还是被动投资，这里的区别极大。资本数额是天文数字，拥有资本即拥有权力，而这一切由很少几位主要资金管理者掌握。事实是，他们使用的资本并非自己的钱，而是客户的钱，拉里·芬克的公司不必是资金的真正所有者，但却是资金的现实所有者。他们利用其他人的钱生钱，正如纽约 JP 摩根大通银行一样，这自始至终都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规律。

所谓“被动投资”只是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因为在选择某一种股市指数时，就是在做根本的决定：应该怎样分配这几十亿的投资？投入哪个国家的股市？是购买特别股还是强势股？这些决定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系统也有自我增强的功能，比如会对一个有代表性的股票自动增购，不管有没有什么问题。红利和股指是不区分“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的，真实的是投资额度的高低。有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被动投资人在所参股公司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他们的股份比例可以影响表决的结果；假如他们不作为，主动投资人的表决就比较容易。

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风险很可能会集中。罗兰贝格咨询公司总裁常博逸（Charles-Édouard Boué）断言：

【“资产管理者持有大量股票和信贷债券，一旦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缺乏头寸，他们的处境就不妙。和银行不同的是，他们不必存有准备金，如果客户要求兑现，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位影响力很大的咨询专家说，资产公司们几乎投资于任何种类金融产品，如果一旦急需现金，它就必须卖掉手中的有价证券，这可能导致卖空潮，导致“投资人竞逃”。这时紧密相连的参股网就会相互传染。因为在这个网络里，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都交织在一起，就像血管里的病毒迅速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黑岩通过相互参股，已经将全球的重要参股企业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参股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中，在全球市场上到处都会出现同名的大股东：黑岩、道富、先锋、威灵顿、资本集团、普信、富达等，在背后操控这个世界的不再是银行，而是这些投资人。看一下美国那些大银行就会发现，如 JP 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等等，黑岩都是它们的大股东之一。黑岩也和道富银行或普信投资等资产管理公司相互参股。总的来看，黑岩在五分之二的美国上市公司中都是最大股东。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又一起参股到一些大的康采恩中，这些康采恩使美国蜚声全球，从埃克森美孚石油到微软。这种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共同所有权”。

我们的数据评估显示，全球最大的 5 家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先锋、道富、富达投资、资本集团）对世界商品市场的控制力有多强。大多数情况下，这 5 家公司在一个市场的参股总和是该市场 4 家最大企业市值之和的 10% 强。无论哪个市场都是如此，比如餐饮业（19.5%）、媒体（18%）、航空业（17.1%）、技术行业（16.8%）、化学（14.9%）、消费品（14.4%）、物流行业（13.5%）或者零售业（12%）。如果没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几十亿投资，什么都转不动。

从根本上讲，黑岩式资本主义遵循了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在德国股份公司的老模式中，有德意志银行、安联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金融集团，它们相互参股，相互交织；它们更是合作方而非激烈竞争的球员；它们创造了系统的稳定。政治经济学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德国科隆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阿克塞尔·奥肯菲尔斯和密歇根州立大学副教授马丁·施迈茨研究了新的黑岩式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它将“给竞争带来静悄悄的危险”。施迈茨发现，和

那些有不同股东的银行相比，由相同基金公司持有大量股份的银行储蓄存款的利息较低；而多元化持股的银行则可以不受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影响而行动。施迈茨举了，民航的例子：一般人以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是不同的所有者（这是传统航空公司竞争模式），但现在一些基金公司成为航空公司的大股东，这些航空公司的票价就比较贵，比一般价格高大约 10%。这种做法会将一些小储户和消费者分化出来，将他们推向金融巨头们。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康采恩的收益率相对较高，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高度集中和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

迄今为止，这种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垄断和团伙力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尚未得到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和研究。施迈茨认为，企业之间应该协商经营政策，寻求相互理解，而不是相互对抗；要更加重视企业规模的益处，使规模经济能静静地繁荣，而不是进行疯狂的价格战。换句话说，我们曾经认识和重视的竞争，已经被一个狭窄的寡头卖主垄断市场所替代。这个圈子由高度一致的股东组成，由基金公司所控制。它们可以促使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天然气集团合并、成立石油-天然气多国公司，这家联合公司利用两种能源，可以获得更高利润。人们也发现，在德国股市股份公司和伦敦股票交易所合并之后形成了一个特殊集团：恰恰是同样的 5 家金融公司——瑞士信贷集团、黑岩、道富、先锋和景顺在两家证交所的参股比例相加，正好是 20%（5 家总共分别持有两家公司 20% 股份）。在孟山都与拜耳合并的案例中，黑岩、先锋、拜耳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三大股东。黑岩是拜耳公司最大股东，持股 7%；黑岩在美国的孟山都是第二大股东，持股 5.8%；而先锋在孟山都是第一大股东（持股 7.0%），在拜耳是第四大股东。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和杜邦公司联姻后，庆祝联姻成功的股东又是黑岩。两家公司合并后又一分为三，这三家在所处行业中都是引领市场的企业。

银行家总说“大到不能倒”，在这里有了新的含义。在陶氏-杜邦案例中，是小的“积极”投资人发起了这次联姻，而后大资本募集集团跟进。这类“积极投资人”往往是对冲基金，它们是黑岩式资本主义的捣乱分子，它们购入较小比例的公司股份，以尽快获得高额短期收益。为此它们投入股份组合，股份比例是 2% 或更低。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就是这类“积极”投资商，该公司的比尔·阿克曼称，他担心像黑岩或先锋之类资产管理公司会用它们的指数基金控制所有美国大公司及其他国家的康采恩，且它们之间互相交叉持股，如此可能随时发生金融瘫痪。比如这种危机会发生在经济疲软的日本股份公司中。在日本的一个网络中，一些重要的股东相互交叉参股，相互组合。资产管理公司的这种状况使政府监督机构很焦虑，比如英国金融机构监管局要求英国安本资产管理公司提高它们的资本缓冲能力。

拉里·芬克绝对不会满足于仅仅复制股市和股票基金，他也直接收购债务，通过黑岩旗下的一家信贷基金放贷。黑岩也拥有一家对冲基金，该基金的行动极具挑衅性。芬克本人也是一位积极投资人。所有这一切都以客户的名义进行，他们想在银行的低利息时期获得正常的利息。这些客户开始偶尔怀疑这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保障和过高手续费：这是一场“用别人的钱”玩的超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像黑岩这样的公司成了强大的中间商，它能支付极高的年薪（芬克本人的年薪达 2600 万美元）。许多股东对此很不以为然，而黑岩正是以他们的名义在玩几十亿美元的循环游戏。这种抗议声目前正在黑岩式资本主义中回响，直到如今。

## 影子银行的阴暗面

在金融世界中，影子银行帝国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在增长，其掌控资金的总额将近 80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银行业务的 25%，期间全球 60% 的贷款发生在正式银行系统之外。简而言之，这里产生了一个并行世界，通过它，越来越多的储蓄资金进入经济循环，与 2008 年类似。那些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基金、资本市场基金或对冲基金所做的许多业务，已经和一家“正常”银行的金融业务无法区分。2016 年 3 月，曾在克林顿政府任职的尤金·路德维希警告说：

【“肥皂泡一旦破裂，将对整个金融业造成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尤金在 1998 年亲身经历了因一家对冲基金的失败给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即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失败。该公司的董事会中有荣获 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莫顿。2008 年该公司被迫低价抛售资产，并不得不申请银行和政策性紧急救助。现在，这类危机从银行转嫁到了影子银行帝国。60% 的美国国债由一些私人基金买卖。

面对新的事实，我们不缺少警告，但缺少合适的政治对策。早在 2015 年 2 月，欧洲央行副行长维克多·康斯坦奇奥就发现影子银行系统的快速增长和相互交织，尤其是投资基金。他认为影子银行可能是“系统性危机的源泉”。为 G20 峰会国家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也认为，非正式银行与公共银行体系结合得越紧密，危险就越大。

影子银行的背后藏着私募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它们从巨富们手中募集资金。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不会在银行界出现，而将在影子银行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恐惧和欲望是资本市场的两极，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称：

【“欲望导致繁荣，恐惧导致衰退。”】

换句话说，欲望使股指走高，恐惧使股指走低。恐惧使那些巨富们把金钱藏在自家的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当前最繁荣的行业之一。

马克西姆·齐默尔多年担任慕尼黑保险公司安联的投资部经理，是欧洲最大的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他说：“公司的账目是我的敌人，我不会挣任何钱。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他的另类投资。”“另类投资”就是与股票和信贷相关的投资业务，这里通行“高风险高收益”的音调。正是这种情形才为影子银行的出现提供了特殊的市场。除了投资于基础设施和私募股权，私人信贷和对冲基金也是影子银行最喜欢的另类银行业务。

这种“另类投资”的世界冠军，应该是纽约黑石集团的史蒂夫·施瓦茨曼，黑石是仰仗私募股权生意做大的。2015 年，施瓦茨曼通过 3 个业务领域实现了更多的营业额：房地产、对冲基金和发放贷款。这些私人信贷基金充分利用了正规银行的弱点，后者要接受国家调控、接受长期压力测试，对贷款发放比较严格。而像施瓦茨曼或者黑岩、KKR 集团、贝恩公司、瑞士殷拓投资、CVC 等投资公司，一般公众并不了解它们的贷款业务，它们要遵守的法律规定也少得多。到 2016 年 7 月底，这个贷款市场的资金猛增到 5600 亿美元之巨，而 2015 年全年只有 4400 亿美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已经为私人信贷打开大门，允许信贷基金直接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尤其突出的是，在信贷基金发放的贷款中，每 3 欧元就有 1 欧元来自退休保险基金。

私人信贷基金也喜欢对大型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投资。安联董事齐默尔说，目前国际上出现这样的趋势，不再是保险公司或者资产管理公司，而是公共退休基金在资助或在进行大型国家基础建设项目。投资人也把目光投向了有吸引力的房地产，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现在德意志银行已经停止向欧洲地产基金提供更多资金，该基金是德意志银行最大的房地产基金。齐默尔认为流动资金量太高了，他甚至考虑“有选择地把一些房地产卖掉，以便平抑房价过高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晾干粉末”（降低资产水分——编者注），但缺少收益更好的投资机会。仅黑石公司就有约 1000 亿美元的“干燥粉末”。

## 数据作为新资本 硅谷作为新霸权

全球化首先意味着资本和数据的全球化。在美国，即使是总统或一位部长，他若想站稳脚跟，就不能绕过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硅谷是美国新的权力基础，正如华尔街是老的权力基础。比如艾尔·戈尔，他曾在 2000 年和乔治·布什竞选总统，自 2007 年后他开始为 KPCB 公司（美国最大的风险基金公司）工作，这是硅谷最有魔力的公司之一。硅谷中的金融公司正在寻找下一个谷歌、脸书或推特。这里的金融工具叫风险资本，公司运营模式很简单，就是“下一个伟大的事物”。奥巴马曾说，卸任总统职务之后，他想成为在西海岸高科技中心的投资人或咨询人。奥巴马请史蒂夫·凯斯这位美国在线公司的创始人，通过网络成功组织了她的竞选和捐赠活动。他也着迷于寻找新的马克·扎克伯格或新的谷歌。他说：

【“我们必须释放每一个美国人的全部潜能……人们永远都不知道谁会有下一个伟大的创意，或者哪一条道路可以通往那个伟大的创意。”】

这个世界明天属于谁？许多特殊的风险资本公司正在和对冲基金、豪门家族或私募股权公司竞赛，看谁先找到下一个数字经济的超级明星。而像康卡斯特、通用电气或谷歌等大公司的投资公司也在搜索，期望灵光乍现。没有哪个词比“独角兽”更能表达想象力和商业的混合。这样的公司一旦产生了价值，将与几年前脸书和谷歌的开创时期不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再是股票上市。它现在就诞生在一轮融资的尊贵小圈子里。假如资金流向了新投资项目，项目的价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极快的方式提升。2016 年年中，这种镀金化的机制用 680 亿美元，把出租车服务平台优步变成了独角兽风景中的神话。自 2014 年开始，优步已经获得了 160 多亿美元启动资本。一轮又一轮融资后，优步这个分享型经济明星公司的价值不断攀升。正是类似的神奇想法，促使风投公司在 2016 年上半年投资了约 400 亿美元（2015 年风投资本总额是 790 亿美元）。不过一个公司真正的价值最终不是由金融投资人决定的，而是在于客户是否购买其产品或服务。而新的金融大亨们约定将这一时刻推后，直到推向充满期望和投资机会的那条路上。经济在这里是一场赌博，一种“价值”可以不值分毫。

这并非仅仅与数字和收益相关，也跟政治相关，即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这种霸权与疲软的商品需求和较低的生产率之间斗争，与产能过剩和巨大的资金量斗争。对这种新经济帝国主义的霸权，马克·安德森做了最清晰的描述。他是网景浏览器公司联合创始人，也是一位传奇投资人。2011 年 8 月，安德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软件正吃掉这个世界》。文中写道：

【“越来越多的商业和工业建立在软件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并作为线上服务提供给客户

——从电影到农产品直到国防……它们占领了固有的工业结构……我期待会有更多的工业被软件彻底改造，也期待会有硅谷新公司，它们会痛击这个世界。”】

今天这个时代深深打上了四大互联网公司的烙印。Alphabet（谷歌母公司）、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控制着全球的数字经济，中国和俄罗斯的数字经济除外。这四家公司股市价值之和大约 1.8 万亿美元，比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比德国整个股市的总市值还多。这四大公司占有全球四分之三的数据传输量，占有人们网上在线时间的 50%。如果涉及大数据，涉及数据的采集、归类、归档和评估，那么在西方世界中任何人都不能绕过这四家美国公司。但是，如果谁想在苹果推销 App，必须得到苹果的许可。

所有人都和这些新的世界权力一起生活。Alphabet 公司凭借谷歌在世界许多国家的网络搜索中拥有垄断地位，它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是 70%，在德国是 95%。这家康采恩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浏览器克罗姆、手机软件安卓和视频平台 YouTube。脸书通过收购照片墙和瓦次普等公司，成功地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苹果的 iPhone 和 iPad 为新的数据和信息世界创造了基础设施。亚马逊面向全球销售商品，再加上微软与它的思凯普和领英，那么互联网公司的强大实力就更形象了。德国和欧洲都无法向客户提供终端产品。

但是，美国和欧洲国民期待的是，这些数字媒体巨头们终于该纳税了吧！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量高达 2300 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在国外账户上，都是通过避税技巧获得的。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企业的国外收益不收税，因为几十年前美国要支持本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产品竞争事实上也就是国家竞争。苹果、谷歌和亚马逊都将自己在欧洲的利润进行系统性管控，降到最低。它们在避税天堂如爱尔兰、荷兰或卢森堡建立许可证或信贷子公司，将收益转入一家“邮箱总公司”的账上去。欧盟委员会发现，2014 年，这些公司对其如此高额的收益仅纳税 0.005%。这些公司如此明目张胆地在全球偷漏税，导致欧盟委员会对以上三国提出了反竞争诉讼，要求这些康采恩必须补缴大量偷漏税款。

这 4 家公司受到的损害，只可能来自它们自己。它们四处游说，过于活跃。在印度，野心勃勃的扎克伯格断言他的项目“自由基础”会向数百万印度人免费提供互联网，他是想说“互联网等于脸书”。扎克伯格本想最终控制所有的互联网接入——这引起了主动投资人和监管机构的注意。到这时价值 4500 万美元的公关宣传也无济于事，脸书不得不撤出印度次大陆。谷歌在欧洲则试图采用魅力公关应付竞争机构的不信任。欧盟委员会则发起反卡特法诉讼，这是对美国霸权的紧急刹车措施。

在硅谷的权力系统中，红杉资本这样的企业算是“老大”。因为谷歌创始人在创业阶段对投资人充满敬畏。这家风投公司成立于 1972 年，红杉资本很早就参股到一些待价而沽的所谓“车库公司”，比如苹果、雅达利和思科。

但是，硅谷最大的金融公司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成立于 1977 的恩颐投资公司，其创始人是理查德·克拉姆里奇，他是第一个向苹果投资的人。他最成功的投资包括纸尿裤生产商迪阿帕斯公司、营销力量公司和酷朋公司，仅仅这些公司的上市就使克拉姆里奇持有的股份价值翻了 150 倍。

硅谷繁荣能够持续多久？越来越多的创纪录公司潜藏着一种信息：这种创纪录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全球资本供应量过多，使股市中技术股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纽约纳斯达克市值两年内下跌了70%。在德国，新的市场突然变成了历史，风光不再。股市观察家比较了股市指数和收益的比例，人们发现2015年，亚马逊的指数收益比升高了538倍，这是令人紧张窒息的比值。而Alphabet和微软的指数收益比值分别是35和28，相比之下西门子是16，奥地利的奥钢联是13，瑞士雀巢咖啡是28。[2]

## 中国虎及其向全球经济的进军

冷战时期，西方人害怕前苏联。现在在经济领域，俄罗斯人的这一角色由中国人接替了。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既采用西方市场经济，又附加了非市场的经济手段，这对他们是一种威胁。

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在全球遥遥领先，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如果全球化这个模式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必须让全世界所有的地方更趋向于富裕。

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经济的旁观者和观察者，也不是依赖西方的黑岩式资本主义，而是已经变成自信的参与规划者。1971年尼克松访华，表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在寻找一个共同的舞台。自从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世界大国之后，它对那些期望脱离贫困、追求更多财富的国家给予了必要的帮助。在非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建筑公司、铁路公司和本地的工人一起施工建设。

2016年，平均每周都有中国企业在收购外国公司，它们经常出现在完全陌生的行业中，这些行业与它们公司的主业和储备技术几乎毫无关联。中国正在变成一个革新大国和具有软实力的国家。西方世界有它们的体育赛事和好莱坞电影，为了应对这一切，中国要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电影和自己的足球胜利。“软实力”是“真实力”，争取霸权的现代世界战争从钱包开始，以头脑中的文化结束。

中国实行温和的、中央调控的市场经济。中国政府灵活而有原则地利用市场机制，以便能够达到自己制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提高6.5%的目标。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世界性体系之争，即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几十年来，我们相信一个自由模式，这个模式允许在商品、服务和党派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它会使活力达到最大化。而在中国，执政党通过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且那些在银行、建筑公司和原材料等行业的国有企业都是世界顶尖企业；这个体系也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企业自由经营。中国体制与西方体制之间的竞争，对西方资本主义颇有益处。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很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生命力之强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人们不应该忘记，我们在世界上很少按纯理论学说做事。在其他地方也有“混合体系”，它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因素组成，比如在法国，国家在很多企业参股，但中国模式更圆润，更严格，更富有义务。“五年规划”规定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它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一起研究制定和发布。中国也制定一些长期规划，比如“中国制造2025”，以及对各



行业比较具体的指示。所有这一切保证了中国未来的大国地位。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创造性仍显不足。中国的重点行业仍然在石油、钢铁和水泥。

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发挥了特殊作用。德国 1.5 万亿美元的公共支出只是中国四大银行资产总额的 13%。这四大银行的控股股东是代表国家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它隶属中国财政部，组织上属于中投公司。通过这种联合可以控制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从而掌控国家的经济结构。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国 80% 的“经济收益”（包括资本投入费用）来自金融行业。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它是中国要求参与世界政治规划的另一个信号。

有 3 家建筑公司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就是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是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承接海外工程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也进行金融投资，同时结合其他贸易活动，比如出售中国制造的铁路装备。

在私人企业领域，比如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美的和苏宁这样的家用电器公司，中国政府对它们的影响是间接的。关于重大投资的决策程序，比如一个中国企业向欧洲进行较大数额的投资，就需要获得中国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

中国所追求的海外投资行业是所有与“工业 4.0”和创新有关的行业。例如，来自广东佛山的消费品生产商“美的”收购奥格斯堡机器人生产商库卡，所报价格之高实属空前，以至于没有其他投资人参与竞价。在几周内，中国人为收购这家著名企业支付了 40 多亿欧元。德国政治家、顾问和经理人将期望寄托在“工业 4.0”上，期望在工厂中将机器设备与机器人联系在一起，将订购、生产和销售通过智能计算机控制相互关联在一起，其中库卡和它的机器人可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长期看来，如果将来更多类似库卡的生意顺利成交，那么生产和技术诀窍会逐步转移到中国去，这将会影响德国作为经济和产业大国的地位。

罗兰贝格总裁常博逸在中国生活多年，他知道，人们喜欢想象在中国的收购行动中隐藏着伟大的计划。常博逸说：

【“您忘记了，中国本来就十分强大。中国重新开放了自己，比如在高速铁路领域。中国的服务业很强大，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有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个国家不断地对原来的西方世界提出挑战，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先地位已经结束了。但这种结束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它促使人们去对自己重新定义，但这不应该使人重新走向保护主义。德意志银行的高管说，中国是“特例”，“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东西都与传统的市场理念没有关系”。但他建议“平静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 如何赢回自己的世界

全球化已经多极化。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富裕，而全球化的反对者担心富人会越来越富，穷人则会越来越穷。如今，人们观察全球化已经 25 年了，但令人恼火的是，问题越来越多。这与新的金融种类的崛起有很大关系。

现在反对全球化的情绪主要发生在发达工业国家。在过去的 25 年中，社会底层的人们确实越来越有依赖性，中产阶级勉强可以维持现状，但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中产阶级同样有可能面临状况下降的危机。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模范国家，二战之后的 30 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工作岗位数量和家庭平均收入这四项指标都在提高。但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断了，占社会人口 1% 的上层，其财富持续不断地增加。在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最富裕人群的财富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例仅为 8%，21 世纪初这个比例已经是 16%，今天按账面计算是 20%。这 1% 的社会上层持有投资基金近 49% 的股票与股份。一名企业负责人的收入是一名普通员工的 280 倍，而 50 年前企业领导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 20 倍。

而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这样的国家，人们认为全球化给本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生意机会，人民的收入由此增加。总体而言，从 1991 年开始，在亚洲有超过 10 亿人口脱贫，其中仅中国就有 7 亿人口脱贫，这是全球化的最大成果。

尽管亚洲在崛起，财富在增长，但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世界上最富裕的 1% 人口（7400 万人）主要是美洲人和欧洲人。他们的平均年收入是 3.4 万美元，这是布兰卡·米兰诺维奇在他的《全球不平等——全球化经济的新发展》一书中核算的结果（原文如此——编者注）。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可谓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上 5% 的最富裕人群，可能获得了全世界大约 50% 的收入；最贫穷的 10% 人口只获得了 0.7%。造成这一不平等状况的原因，正在于全面繁荣的金融行业。很长时间以来，金融行业动用资金的数额，超过了本应进行的理智投资数额。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将利率降到极低，更加重了这种危机状况。长期以来，人们进行储蓄、投资国债以使资产增值，一般公民不能像社会富豪那样，他们买不起昂贵的房地产和某些金融产品。在德国，有近 10% 的收入用于储蓄，只有 7% 的德国人持有股票；在奥地利这个比例只有 4%。在富裕的瑞士，这个比例则高达 18%。这一切都导致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普通储蓄者的资产被剥夺。

一个不平等紧接着另一个不平等。一些人有了网上账户，另一些人有了资本管理者。一些人等待利息率的转变，另一些人将自己增加的收益继续投入冒险之中。最近几年，真正的高收入者是那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私募股权专业人士和影子银行的贷款人。而另一面，与它们平行的机构是受到严格监管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对一些大的资本集团而言，整个世界就是它们的游戏场，它们的游戏也建立在数字技术上。遗憾的是，从劳动收入转向资本收入这一话题并没有在公众中充分讨论。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已经是讨论这一话题的合适时机，

【“乘机器人和经济掠夺性强盗还没有把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之前”。】

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在工业发达国家中，人们收入中的工资收入所占比例降幅很大，而来自资本和独立劳动获得的收入所占比例在迅速提高。从 1980 年到 2015 年，德国工资占总收入的比例从 63.7% 下降到 56.6%，在美国这一比例从 62.1% 下降到 57.6%，在英国这一比例从 62.8% 下降到 56.3%，在法国这一比例从 65.6% 下降到的 58.2%，在奥地利这一比例从 63.9% 下降到 55.6%。这是一种普遍统一的发展趋势。

观察不断扩大的资产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可以说，分配问题是权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牢牢掌握着这项权力，就是通过税收、资金周转、刺激经济政策来修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的经济发展。

关于国库收入，应该要求国际社会通过纳税证明的全球化来应对避税的全球化。最高的基本原则是：在哪里的市场产生了收益，就应该在哪里纳税。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再发生：一些引领市场的工业企业通过全球避税技巧，以牺牲大众利益为自己获得特别的收益，然后它们完全凭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大众中的一组人，将避税所得重新分配给他们。康采恩的内部结算不会产生真正的收益。偷税漏税的大洞应该堵上。

目前，总计有 21-32 万亿欧元的款项在海外公司账目上。这些海外公司多数是“邮箱公司”。有必要建立公共透明的登记册，注明哪些企业在哪些地方设了子公司且有收益。真正的公司所有者不应该躲在托管公司之后，国家之间交换税务信息应该常态化。真正的全球化应该包括公开化，包括揭露偷漏税中心。这些偷漏税中心位于巴拿马、开曼群岛、英国维京群岛，也在爱尔兰、荷兰、卢森堡或美国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

世界上偷税漏税最大的帮凶，其实是一些大国。在美国的特拉华州、怀俄明州和内华达州有一些专门做偷漏税生意的公司。德国的康采恩也喜欢利用这些公司。卢森堡多年的财政部长让·克劳德·容克在他的小国建立了完备的税收赠送系统，借此将一些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吸引到他的公国来。令人更加气愤的是，容克不承担这种作法的政治责任，相反，那些揭露这个系统的人却遭到了政治迫害和追捕。

具体应该做的，就是持续获取每个人的任何一笔税收信息。美国在这方面是模范：每一位美国公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一笔收入，都必须在自己的家乡纳税。谁上交了自己的护照，也必须继续在美国履行 10 年纳税义务。不过很遗憾，这一规定对美国公司无效。正如我们看到的，全球化也意味着争取最优厚部分的分配额的斗争。

金融问题、不断扩张的金融行业、国际低税率等，这些问题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是在国际平台上解决。为此，国际债务会议和由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参加的财政部长峰会是有必要的。所谓“新常态”就是零利息和暴富，这一状况终将结束。实际上，缺少足够的投资机会使那么多资金用于投资，而实体经济缺乏发展机会，是时候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了。

我们有必要重新观察我们的世界，我们还没有对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机彻底进行处理。在房地产贷款崩溃之后，国家机构立即进入了危机模式，以便在雷曼兄弟公司垮台之后，借助黑岩和高盛这样的金融公司，防止更严重事态的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就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预防措施。国家债务继续增加，且增幅极大。全球应该召开一次世界金融会议，做出一项决议，建议减少债务，更好地保障金融业务的安全，同时应该就持有某种金融产品的时间期限做出规定，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债券的持仓时间；而且应该引进国际汇兑税，统一在全球执行，毫无例外，税率最高达 1%。

美国通过四大互联网公司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提出的技术挑战，美国资产管理公司的权力，中国经济的继续扩张，以及阿拉伯石油国家的国际战略，这一切都要求建设真正的欧洲统一内部市场和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那种自恋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称金融资本主义为新资本主义，它正处于合法性危机中。因此，聪明的投资人越来越注重投资项目的环境、社会和管治指标。金融资本家中的思想领袖进行秘密商讨，试图找到长期的优秀企业领导准则。他们期望能够及时地按照他们的主旨改进这个系统，他们想更好地履行企业所有者在传统家族企业中的义务和责任。但也许结果很简单，就是支持家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好地帮助新创企业成为新的企业家。

凡是黑岩式资本主义过于强大的地方，那些上市公司应该有意识地发展企业所有者文化。西门子董事长乔·凯泽的想法很有道理，即通过雇员参股，给企业赋予新的经营目标。按照他的模式，西门子康采恩将属于创始人的后人、公司管理人员和公司员工，而非激进投资人的游戏工具。这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最后的理想结果是人们属于自己，不属于其他人。

“这世界属于谁？”我们认真讨论了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状态，提出了权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已经消失，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不再依赖于我们，也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老板们，即使他们是强大的首席执行官；也不再依赖于议会或各国政治家们。我们的经济和财富依赖于管理着巨额资产的那些人，其资产规模之大难以想象。他们可以让资金在全球流动并追逐资金。他们利用其他人的资产在工作，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人造世界”。所谓其他人的钱，可能是富人委托他人运作的储蓄资金、或者养老金、健康保险金、事故保险金，以及公民缴纳的税款和其他国家收入。正是通过利用这些资金，那些资产管理者们、基金经理们和所有那些资本的主人们想出了一个新的说法，说这样可以让我们共同富裕。这个幻想实际上是新的危险，即：这个世界很快会遭遇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正在逼近的迹象已经越来越多：在影子银行中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风险状态。问题是，什么会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的导火索？美国史佛公司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时，该公司的股值发生狂跌，这会是导火索吗？在腐败成灾的巴西，股票指数下跌或贷款取消，这会是导火索吗？对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估值已经是天文数字，这会是导火索吗？

所以说这些都是风险所在，是因为：运营者不仅仅是那些利用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人；而且对整个运营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资金最终能否及时交换成真实的所有物，“钱”是否能够变成“真实的资产”，比如房屋、酒店、工厂、港口、机场、购物中心、黄金、艺术品，或者已有企业的股份。

新资本主义的运营者过分追求满足自己的贪欲。对于这种贪欲，市场的回敬就是不景气和萎缩。在市场发生萎缩之时，恐惧和贪欲的整个游戏又重新开始。对于这种贪欲，人们应该以一种政策来回敬它，这种政策应在新的世界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它不应使人退回自己的国家，返归自己的私人田园。能否实现并非毫无指望，这也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自由派经济学家兼哲学家约翰·史图瓦特·米尔向迟疑者建议道：

【“一个有信心的人比99个有兴趣的人更强大。”】

[1]原文: Who' s the closest to the money, makes the most money.

[2]引文索引: 美国在线(AOL); 独角兽(Unicorn); 国际广场(Square); 网景浏览器公司(Netscape); 《为什么软件正吞掉这个世界》(Why 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 “自由基础”(Free Basics); 红杉资本(Sequoia); 雅达利(Atari); 恩颐投资公司(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 迪阿帕斯公司(Diapers); 营销力量(Salesforce); 酷朋(Groupon); 奥钢联(Voestalpine); 思凯普(Skype); 克罗姆(Chrome)。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19年第五期, 授权察网发布】**